



台湾著名作家

钟肇政 著

台湾人三部曲

沉

沦



广播出版社

I 247.5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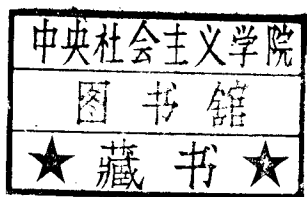
200088047

54768

台湾人三部曲

第一部 沉沦

钟肇政



广播出版社

DQ9/07

台湾人三部曲
第一部 沉沦
钟肇政

广播出版社出版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大32开 12.5印张 300(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0册

统一书号：10236·014 定价：4.00元

1.25

总 序

一九八〇年六月，台湾省远景出版社以完整面貌出版的长篇小说《台湾人三部曲》（《沉沦》、《沧溟行》、《插天山之歌》），是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钟肇政先生历经二十年左右苦心经营的文学巨著，是第一部反映台湾人民五十年抗日战争的民族史诗，是洋溢着台湾乡土芬芳的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卷，是当代台湾文学一座巍然高耸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全书近百万字。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同胞的文学交流不断发展的今天，也终于同全国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广播出版社出版、介绍台湾文学作品的又一次盛举。

台湾当代乡土文学的小说大家

本书的作者钟肇政先生是台湾省桃园县龙潭乡人，生于一九二五年，是客家同胞。他曾在台湾大学读书，未毕业。历任小学、中学及大专学校教师，现任《台湾文艺》社长、《民众日报》副刊主编、“吴浊流文学奖”主任委员。

钟肇政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文学活动，五十年代末期趋于成熟阶段，确立了继承和发扬日帝据台时期乡土文学传统的创作道路，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鲁水花》，受到普遍好评。六十年代以来，他以大气磅礴之势，陆续发表了《浊流三部曲》（《浊流》、《江山万里》、《流云》）、《台湾人三部曲》（《沉沦》、《沧溟行》、《插天山之歌》），此外还有《望春风》、《绿色大地》、《钟理和的故事》、《八角塔下》等多部长篇小说，确立了他在台湾现代文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钟肇政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及文艺论著和翻译作品，总计文学活动已有三十余年，作品已有五十部左右。一九七九年他获得了台湾第二届“吴三连文艺奖”。从他的作品之多，影响之大来看，实不愧为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小说大家。

台湾人民五十年抗日战争的民族史诗

《台湾人三部曲》在艺术构思上具有胸怀广阔、气势雄浑的特色。作家深深感到台湾同胞“用血、用泪、用骨髓”写成的反抗日帝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伟大民族史诗”，决心要写这样一部“大书”。他远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孕育，并曾与文坛前辈钟理和先生交换了意见，经过长期酝酿、准备，起笔于一九六四年，直到一九七六年终竟其

功(全书原曾分别在各报纸断续连载)。

《台湾人三部曲》以甲午战后到抗战胜利的历史为背景,以台湾陆氏家族的爱国抗日斗争为主线,并与台湾和祖国大陆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结,创造了鲜明生动的文学形象,凝聚着台湾同胞满腔的爱国热情,贯穿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传统美德,表明日帝侵华割台,犹如对祖国母体伤其骨肉,而不能断其血脉,众多优秀中华儿女代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抗日斗争,表现出在宝岛沉沦浩劫的残酷袭击下中华民族血脉的坚强搏动!

第一部《沉沦》着重反映清廷卖国割台初期台胞保卫宝岛的武装斗争。台湾陆家第一代祖先荣邦公是十八世纪后期由广东长乐移居台湾岛的,从打长工、垦荒地创业,到第三代信海公开始读书,成为当地设塾授学的名师,陆家也成为晴耕雨读的名门大族。信海公七十一岁大寿时遭到割台的“亡国之痛”,以其第三子仁勇为首,率领陆家子弟兵数十人,祭祖誓师,奋起抗日。信海公在誓师祷词中说:“惟我台土,神州之邦……惟我神州,岂容沦丧……执戟攘夷,誓与存亡……灭彼丑虏,日月重光”,表现出当时台胞同仇敌忾的民族大义及鲜明强烈的爱国反帝精神。陆家子弟兵先后报效在著名民间抗日领袖吴汤兴、姜绍祖旗下,转战杀敌,屡立战功,大都英勇战死。此后,“陆家人因为从事抗日活动,田地大部分被没收……都成了贫穷的人家”。

第二部《沧溟行》的历史背景,推到了台胞武装斗争转入低潮后的本世纪二十年代,主人公是陆家

第六代的爱国青年陆维梁。他继承了陆家祖先抗日传统,以孙中山先生为榜样,怀抱着献身同胞、救国救民的革命志向,走乡串户,访贫问苦,公开演讲,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反剥夺、反压榨,同具有侵略者和地主双重身份的拓殖会社进行了尖锐的请愿抗租斗争而遭日警逮捕,经从事文化运动、农民运动的爱国同胞一系列合法斗争的营救,入狱半年后获释。随即跨越沧溟(海峡),前来祖国大陆,继续为唤醒“睡狮”、振兴中华、解救同胞而奋斗!

第三部《插天山之歌》描写四十年代初期陆家第七代的志骧留学东京,参加了秘密抗日组织,潜回台湾工作,被日警跟踪追捕而隐蔽于插天山,如鱼得水般生活、劳动在爱国亲友和爱国群众的掩护中。狡猾老练的桂木警部追踪二十个月终于抓到志骧的时候,只关了一个晚上,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志骧满怀激情地走出狱门,迎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可歌可泣的历史背景

《台湾人三部曲》既是统一联系的整体,又可分别独立成篇。全书的艺术构思完全忠实于日帝据台五十年历史发展的进程,选取了前、中、后期三个典型的阶段加以重点突出的描写,体现出各个历史阶段抗日斗争所具有的显著不同的特征。如能联系台

湾历史来阅读《台湾人三部曲》，当可倍收相得益彰之效。在历史上看，从一八九五年割台以后的二十年间，日帝侵台政策主要是武力征服和镇压，任命台湾总督的资格均以大将或中将军人为限。这阶段台胞武装抗日起义纷起，不下数十次，特别是在一八九五年六月日军登陆台湾的早期阶段，民间武装抗日斗争尤其激烈和悲壮。当时的苗栗吴汤兴和新竹姜绍祖都是台湾名垂青史的民间抗日领袖人物，陆家子弟兵正是他们所领导的民间义军中的一支有生力量。由于没有坚强统一的正确领导和抗战武器的原始落后，多次民间武装抗日起义均遭失败。在一九一五年的“西来庵事件”，即余清芳所领导的以宗教名义为掩护的起义惨遭镇压后，台湾同胞的武装斗争转入低潮。此后，从一九一八年起，日帝开始派文官总督治台，高唱“日台一体”、“内台共学”口号，宣称扶植台人自治。在二十年代，正值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及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之后，台湾同胞的文化思想和民众运动比较活跃。一九二一年，民族革命家、民主斗士蒋渭水（1891—1931）等人在台北领导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随着文化协会所开展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又先后成立了“台湾农民组合”（拥有两万多名会员）等群众团体，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合法斗争。日本殖民当局在《总督府警察沿革志》中承认，文化协会所组织的大量演讲，“开本岛农民运动与劳工运动的先河”。第二部中主人公陆维梁的爱国抗日斗争正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进行的。书中爱国抗日的民

众领袖简溪水医师显然就是文化协会领导人蒋渭水的化身，维梁参加简溪水领导的对日本皇太子请愿的一幕，就是在蒋渭水传记中发生于一九二三年的真实历史事件。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日帝为了配合侵华战争的需要，加紧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重新委派军人为台湾总督，恢复其军事独裁统治，合法斗争不复可能存在，台湾同胞爱国抗日人士被迫隐蔽精干，或回归祖国，或转入地下，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

台湾同胞爱国者的群像

《台湾人三部曲》歌颂人民抗日战争的重大主题，决定了在创作上的另一个显著特色，就是集中力量塑造正面人物，或用工笔，或用素描，或由正写，或由侧叙，为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台胞爱国者的群像。第一部中全力支持子孙们武装抗敌的信海老人，自幼练拳打猎、最早默默备战、联络义军抗日的仁勇，宣称“日本仔休想吃到我们做的一片茶，我们种的一粒米”、积极上阵与敌人肉搏的纲仑，年过花甲、以农用刀为武器横扫日寇救了仁勇的陆家老长工阿庚伯，广交江湖豪侠、指挥数百名义军的民间抗日领导人胡老锦；第二部中爱国抗日、关怀青年的民众领袖简溪水医师，反对儿子读日本书、痛斥儿子与日本姑娘交往的维梁母亲，精通法律、善于合法斗争的农民

运动领导人黄石顺；第三部中参加秘密抗日组织的革命青年陆志骧，以陆家抗日传统教育鼓舞志骧的纲云叔公，老练世故、巧于同日警周旋而掩护志骧的李阿丁姑丈，曾经在辛亥革命后回归祖国做过总理卫士又返回台湾的张凌云先生，等等，都具有真实感人的鲜明个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的阶级不同、地位各异、处境有别，但毫无例外地都怀着中华民族的深厚感情和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第二部的爱国青年先锋人物陆维梁的形象塑造得更典型和突出。作家采用工笔手法，极为细腻地描绘了维梁的思想成长过程，刻画了维梁内心世界的崇高情操。维梁少时受过仁智叔公（信海公第二子）的汉书教育，受到祖国民族文化的熏陶，又受到殖民当局六年制公学校的初等教育，“因为成绩优异，所以校方鼓励他报考当时台湾的最高学府，也是唯一的中等学校，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即日语学校）”，这是通向做一个殖民地文官的道路。由于母亲牢记着陆家人是“堂堂炎黄世胄”，坚决反对维梁“读日本蕃的书”，维梁就从乡下到台北谋事，在日人松崎书店当了店员。维梁勤奋好学，刻苦自修，每天只睡六个小时，得以博览群书，从而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祖国——东方第一大国，自己的民族——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也认识了世界——要求民族自决、民主与科学的世界，从而成长为二十年代的“一个有思想、有眼光、有毅力，也有崇高理想的现代青年”，走上了一条爱国的革命的生活道路。他回避了店主独生女儿文子对他的痴情追求，

毅然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被捕出狱后，最终回归祖国大陆作为他寻求乡亲们解放之道的归宿。当他决心前来祖国大陆的时候，“想想那古老的伟大的国家，又朦胧又神秘，令人无限好奇，无限景慕，无限向往。日本仔也有人说过了，那是一头睡狮。既然是睡着了，必有一天会醒来的，那时它就会成为一头雄狮，仰天一吼，日月都要为之无光，天地都要为之震撼的。让她能早一日醒过来，这不是每个汉民族子弟的使命吗？”维梁的这段内心独白反映了台湾二十年代的文化运动和农民运动是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读来，仍然是那么动人心弦！

台湾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卷

作家描写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主题，歌颂斗争中的正面人物，并不是孤立地、单调地去表现主人公们的斗争事迹，而是把他们的成长和斗争放在正如生活本身那样的典型环境中，从而为我们展现了台湾人民生活绚丽多姿的风俗画卷。在这广阔的画卷里，鲜明的台湾乡土色彩和强烈的中华民族色彩融为一体，构成了本书创作上的第三个特色。

在本书中，举凡台湾同胞在日据时代的衣食住行、劳动生产、婚姻家庭、风俗习惯、道德面貌……各个方面都有着历史真实的再现，能使我们犹如身临

其境。比如第一部中作家这样描写胡老锦的住房：“庄宅四周是一道长得密密麻麻的观音竹，有三四丈高——这也是农村常见的，为了防风防盗匪，竹丛几乎是每个农家所不可缺的……除了正中前面留下的一个缺口自然形成拱门可供出入以外，几乎是密不透风，任何人要想从竹丛穿过去，那就一定会被竹刺、竹叶和竹桩刺得遍体鳞伤……”正是在这样的庄宅里，抗日义军用土炮、鸟枪对准竹丛缺口的拱门轰死了数十名日军，击退了第一次来犯的大队人马。又如第三部中描写志骧在维昂伯父家过春节的情景，殖民当局企图割断台湾同胞同祖国的感情而严禁过旧历年，作家写道：“但是，在我们台湾人的观念之中，年依然非过不可”，“年关到了，就偷偷地蒸年糕，偷偷地宰杀鸭鸡”，“一家团聚吃年夜饭”，守岁念祖。日警则乘机到户检查敲诈，维昂伯送给台湾人改为日本名的吉村巡查一只大阉鸡方得完事。一家人自慰地说：“就当做给狗吃了吧！”以上这些描写既具有地理气候、自然风光的特征，又具有社会历史的特征，使读者感受到浓郁的台湾乡土气息和亲切的民族感情。

陆氏家族是世代种茶的客家同胞，作者对茶叶生产的劳动场面、工艺流程，以及劳动人民的纯朴、乐观和智慧都有着绘声绘色的精采描写，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在春天采茶季节里，男女青年往返对唱的客家山歌在青翠欲滴的茶园里飞扬；在做茶间里，“此刻正给水蒸气、茶香以及一股从火炉里辐射出来的热气笼罩着。谈笑声，吆喝声，加以炒茶匙与

茶锅碰撞的金属响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凡”。经过台胞巧手制作的乌龙茶驰名海内外市场。更妙的是，茶菁受到云蛾虫灾，本是“严重事态”，但是，“老茶农阿四叔却仍然若无其事”，他能够经过难于掌握而成功极少的制法，采用“出云蛾的茶菁”制成一种特殊的优质茶——“膨风茶”，“普通的茶如果每百斤能卖到二十个银子”，“而膨风茶每百斤从未少过九十个银”！

革命青年的爱情观

本书的主要人物大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即使在那饱经忧患的年代，生活中也免不了爱情的火花。作家在本书中穿插了不少青年人的爱情描写，反映了作家所理想的，也是当时革命青年的健康的爱情观。在割台前夕的和平生活中，纲仑、纲嵩堂兄弟都是二十来岁的未婚青年，他们虽是名门大族子弟，但都没有脱离生产实践，经常接近劳动人民，较少门第观念。纲嵩和贫农采茶姑娘桃妹热诚相悦，纲仑同泥瓦匠人阿熊师的女儿秋菊真诚相爱，均已论及婚嫁。但在抗日义军兴起时，他们都是抗日先锋分子，毅然参加义军抗日。维梁在台北时受到日人松崎店主独生女儿文子的热恋，维梁在内心里也是爱文子的。但是，由于两个不平等的民族矛盾，维梁母亲和文子父亲从不同立场出发都激烈反对两人的关系，松崎父

女的矛盾也已威胁到文子的安全。维梁认为，爱情应该保证对方的幸福，更应该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始而从松崎家隐退，继而在文子追到乡下时婉拒，终于摆脱了同文子的爱情纠葛，全身心投入到乡亲们和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志骧是留学东京受了高等教育的“工学士”，有许多日本和台湾姑娘喜欢他。不过他认为，“做为一个有为的人，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同胞，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他没有闲暇，也没有那种心情来谈情说爱”。他参加秘密抗日工作被日警追捕而隐蔽在插天山中做伐木工的日子里，遇见了贫穷美丽而聪明能干的山村劳动姑娘黄奔妹，“竟那么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在奔妹向志骧报警、为志骧带路而救了志骧以后，他们在共同抗日爱国的思想基础上和患难与共的生活实践中建立了真挚的爱情，结成了美满的婚姻。从这几位主要人物的爱情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在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台胞青年是如何对待爱情的。他们做到了打破门第观念，相爱忠贞不渝，亲近劳动人民，服从革命事业。本书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借鉴：一些文学作品描写爱情固不可免，问题是如何写，关键是要把爱情放在生活中适当的位置上。

瑕不掩瑜

《台湾人三部曲》并不是一部璧玉无瑕的作品，

在艺术上也自然有其可以探讨的缺陷。主要的是，由于作家生活经历和切身感受的关系，对和平生活的描写虽然能够娓娓动人，但对斗争生活的描写则比较逊色；同时，作家在三部曲中对敌人和反面人物很少着墨，以至令读者感到对实际生活中抗日斗争的悲壮、激烈、复杂、尖锐，反映得还不够充分。其次是三部曲的总体布局令人感觉不够匀称。第一部基础雄厚，场景广阔；人物众多却又悄然而逝，展开不足，在第二部中全然不再出现，未能得到较为理想的联系和发挥。第三部则显得是强弩之末，人物的塑造和斗争的描写比较薄弱、乏力。但从以上几个主要方面的成就看来，它的确是一部瑕不掩瑜的“大河小说”，不失为关心祖国、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力作，是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名著，必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其应得的地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

武治纯

1982年5月

第 一 部

沉 沦
